

伍尔夫对布鲁姆斯伯里圈 文艺观的接受与超越^{*}

邱 高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布鲁姆斯伯里圈是英国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精英文化团体,以反传统性和现代性著称。小说家伍尔夫作为圈中核心人物,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与圈内所提倡的文艺观展开积极对话,其文学创作活动体现出鲜明的布鲁姆斯伯里式精神气质,即对纯美艺术的不懈追寻、情感与智性的自由协作。伍尔夫对布鲁姆斯伯里圈文艺观的超越体现在其创作形式观、生活真实观、双性同体观的理念中,为英国文学史留下了不朽的印记。

关键词:布鲁姆斯伯里圈;弗吉尼亚·伍尔夫;文艺观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章编号:1007-4074(2019)05-0154-07

作者简介:邱 高,女,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布鲁姆斯伯里圈(The Bloomsbury Group)是 20 世纪英国伦敦的一个知识精英文化团体。该团体从 20 世纪初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二战爆发使其成员们分散到全国各地,战前固定而直接的交流不复存在。1941 年,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的离世标志着这个文化团体的正式终结。

布鲁姆斯伯里圈对英国文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成员们极具怀疑精神与抗争意识,质疑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权威,从文艺角度进行反思与颠覆;另一方面,他们极具智性品格与包容意识,积极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试图以改造、普及艺术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改良。基于共同的价值理念,成员们从文学创作、绘画设计、哲学研究等领域展开积极对话,和而不同的思想在当时的文化社会中极具先锋性。伍尔夫作为核心成

员,深受该团体文艺观影响。她将小说视为她的实验场,对文学创作进行大胆创新,其美学思想也取得了极大突破,最终成为了英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出代表。

一、布鲁姆斯伯里圈文艺观探究

布鲁姆斯伯里圈形成于英国现代主义观念萌芽的 20 世纪初期,这是一个复杂且矛盾的时期,虽不乏强调反叛与变通的“现代意识”,却仍然保有传统的“维多利亚风尚”(要求人们严谨、恭谦、自律、顺服,并将之视为修身处世的教条,身体力行此类行为道德规范)。文化艺术也受到宗教习俗、政治宣传等因素的影响,被要求传达维多利亚式的道德标准。布鲁姆斯伯里圈正是在此种文化背景下逐步形成。

^{*} 收稿日期:2019-06-04

“布鲁姆斯伯里圈”一词并非成员所创,而是莫莉·麦卡锡在1910年左右整理友人名单时所创。布鲁姆斯伯里圈的第一次正式聚会发生在1920年3月4日,但其源头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的剑桥。学生团体使徒社与午夜社的交流使得一大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学子相聚一堂,斯蒂芬·索比(Julian Thoby Stephen, 1880—1906)便是其中一员。1904年,索比的父亲去世,众多剑桥好友前来拜访。逐渐地,吊唁转为哲学交流,布鲁姆斯伯里圈最初的聚会模式逐渐形成,伍尔夫也开始慢慢接触这些知识青年。1906年,索比因病早逝,给布鲁姆斯伯里圈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这时的布鲁姆斯伯里圈尚未完全形成,却因索比的死得到了空前的加强,索比好似纽带一般将整个团体聚拢到一起。索比离开后,伍尔夫搬到了费兹罗伊广场29号,并开始举办“星期四之夜”。布鲁姆斯伯里圈中谈话的格局得到延续与进一步强化,探讨的内容由抽象的形而上和充满智性的哲学主题变为更加直入生活的话题,而原来在戈登广场46号的周四聚会则改为了“星期五俱乐部”(Friday Club),活动内容与艺术相关。至此,布鲁姆斯伯里圈形成了两个文化交流中心,成员们长期保持着和谐友善的关系,交流之间的互补性与创造性更是为整个布鲁姆斯伯里圈的文艺观增添异彩,形成了一方文明天地。

纵观布鲁姆斯伯里圈,它并非有组织、有纲领、严格的有机组织,它更像一个松散的群体。这个群体坐拥了一系列日后将在英国文学、艺术、社会、思想史上熠熠生辉的大咖,例如女性主义先驱伍尔夫、传记大师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Maynard Keynes)、文艺批评家罗杰·弗莱(Roger Fry)和克莱夫·贝尔、画家瓦内萨·贝尔和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等等,哲学家罗素、诗人艾略特与小说家福斯特虽不是圈内成员,但与该圈交往甚密。他们时常聚在一起高谈阔论,不为权势,只为共同分享彼此的思想观念与兴趣爱好。实际上,在英国文化传统中,谈话时常带有激发文思与活跃公共智识生活的作用。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空间理论的兴起,使得各类沙龙和聚会中的谈话成为社会风尚与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文化评论家克莱夫·詹姆斯就曾指出:“谈话并非仅限于咖啡

馆,在整个文化中,直到纳粹毁掉一切之前,谈话是一种存在方式。”^[1]对于布鲁姆斯伯里圈的谈话而言,剑桥大学的教育背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充盈着智性的宝库,语言艺术和理性思辨在热切交流中迸发出了璀璨的火花。其中,G. E. 穆尔(G. E. Moore, 1873—1958)对年轻人起到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穆尔的《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是一部具有革命意义的著作,对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风俗、传统智慧进行了批判。穆尔在书中宣称:“我们所知道或能想象的最为有价值的事物,是某些意识状态,可以大致将其描述为人类交往之快乐或美的对象之享受。”^[2]这句话被布鲁姆斯伯里圈奉为生活准则。梅纳德·凯恩斯认为,穆尔哲学在当时主导了他们的全部思想,指引他们通往新天地:“就像一种复兴的开始,一个新天地的出现,而我们是新秩序的先驱,无畏无惧”^{[3]82-97}。利顿·斯特雷奇更将《伦理学原理》的出版之日——1903年10月——视为“理性时代的肇始”^[4]。可见,穆尔对于当时的布鲁姆斯伯里人而言,是一位精神导师。穆尔所强调的“意识状态”成为其成员文学艺术追求的重要理念,在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中更是得到了鲜明呈现。穆尔对审美体验和个人认知的追求,也使得布鲁姆斯伯里圈极其强调个体的情感经验。凯恩斯强调:“值得为之激烈思考与畅谈的对象,包括所爱的人、美与真理,但生活的首要目标是爱、创造、对审美体验的享受,还有对知识的追求。”^{[3]86}穆尔的思想对成员们最大吸引力在于,它宣告了思想的解放,为布鲁姆斯伯里圈的艺术言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布鲁姆斯伯里圈致力于“人类交往之快乐”,追寻情感与智性的自由协作。虽在外界看来,他们关系混乱,但其内部交流频发、关系紧密,共同追求智性与情感的交融,无论亲情、友情或是爱情都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们中的部分成员更是有着独特的双性恋情结,且不加掩饰地表达着对爱的需求。例如,伍尔夫、斯特雷奇、格兰特、加内特等均有着双性恋倾向。他们独特的思想情感使得自身的两性因素得以互补,而其美学思想也转向一种既灵动感性又严谨理性的领域。伍尔夫笔下随性自由、拥有饱满人性且兼具两性气质的主人公奥兰多成为了人格理想的美

学标志。斯特雷奇也对传统观念体系下的“善”进行了重新审视,对传统传记发起了改革。他批判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观,希冀“用简单的话语毒死那些弄虚作假的妖怪”^[5]。在《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中,利顿打破传统的传记写作方式,省略对传主的主观性评价,引领读者在一番思考后得出属于自己的结论,以特有的戏谑方式破除了所谓历史名流身上的光环。公众将其视为轻浮、冷漠的讽刺家,实际上他更像鞭策时代的道德家,将读者引向正确生活和正确判断的方向。他的反传统思想影响了后世对传记文体的看法。他通过对人物的撰写、对维多利亚时代跌宕起伏的社会图景的描绘,表达了对整个社会与时代的重视。伍尔夫曾在散文《传记文学的艺术》中对利顿的“新传记”进行专门研究,盛赞其将传记打造成艺术的同时又保留了其血肉丰满、极富启发性的因素。受利顿“新传记”风格的影响,伍尔夫更是为狗立传,以撰写《弗拉西》的具体行动挑战维多利亚时代的伦理观。而格兰特也从绘画领域给予回应,通过对男性躯体的专门画像无声地反抗英国同性恋歧视现象。在他笔下,体格阳刚的男性躯体时常散发出温婉阴柔的气息。弗莱称其为“英国式的画家”,夸赞他的创造蕴涵了一种独特的品质,包含着“独特的顽皮而又怪诞”的因素,使人不禁联想起伊丽莎白时代的诗歌^[6]。“绘画领域中的创意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文学的或者再现的元素……创造者是有必要考虑用头脑创造出来的东西究竟有何意义的。一旦找到主题,他便可以为了呈现这个主题,而完全沉浸在寻求相应风格的努力之中了。”^[6]作为一位“有着双性恋倾向的同性恋者”,格兰特透过文艺抒发压抑的情绪与欲望,追寻情感与智性的协同发展,成为了 20 世纪英国酷儿艺术的杰出代表。

与此同时,布鲁姆斯伯里圈还致力于“美的对象之享受”,并通过发扬形式观的美学思想追寻纯美艺术理念。在布鲁姆斯伯里圈中,文学与艺术是一种交融发展的共生关系。基于对审美体验的共同追求,成员们始终保持着永恒的激情,在文学艺术领域追寻真善美,并致力于排除功利主义的痕迹。在绘画领域,弗莱极其推崇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的后印象派绘画。在《视觉与设计》(《Vi-

sion and Design》)中,他阐释了关于形式主义美学的观点并强调了“形式”的重要性。弗莱认为,“形式”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纯粹形式,所有的美感都存在于这种纯粹的形式之中,而“内容”只是随形式转移的因素,并非现实生活中具体的内容。经过艺术创作的改造,内容已经变得抽象化、审美化、艺术化了,不再独立于形式而存在。因此“形式”的重要性超越了“内容”,艺术家们应该合理运用色彩与形式的安排,而非主题内容,来表达他们的情感。贝尔对弗莱的形式主义美学观点表示赞同,并在他的理论基础上发扬了“有意味的形式”。他指出:“在每件作品中,以某种独特的方式组合起来的线条和色彩、特定的形式和形式关系激发了我们的审美情感。我把线条和颜色的这些组合和关系,以及这些在审美上打动人的形式称作‘有意味的形式’。”^[7]在对纯美艺术追求上,伍尔夫也从文学之域高空喊话,强调“书的本身”并不是真正的形式,真正的形式由感情所引发,却又能够稳定、控制并建构感情,因此一切都可以构成小说的恰当素材,小说艺术本身就是记录生命的艺术形式。在布鲁姆斯伯里圈中,形式成为了表现情感的一种艺术。无论是在绘画或是文学领域,布鲁姆斯伯里的智识青年们都以各自的行动践行着他们所追寻的艺术理念。

二、伍尔夫对布鲁姆斯伯里圈文艺观的接受

布鲁姆斯伯里圈是具有高度精神契合的文化群体,他们标榜“反传统”的气质,在聚会时畅所欲言,反对维多利亚时期以来虚伪的道德规约和世俗文化。但是,尽管布鲁姆斯伯里圈对当时的英国社会有所不满,他们寻求的并非改革,而是改良。与布鲁姆斯伯里圈交往甚密的奥斯伯特·西特韦尔(Osbert Sitwell)指出,布鲁姆斯伯里圈的成员在谈话中时常提及“精致的高度文明”与“简单的不同寻常”^[8]²⁵,这听上去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又异常空洞,实际上,前者是在强调文学艺术对社会发展的恒久价值,后者则是在强调以文化培育一种难能可贵的心智状态。布鲁姆斯伯里圈始终相信文艺的内在感召力,渴望以文化洗涤国民精神,从而达成一种改良。换句话说,布鲁姆斯伯里

圈既非“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也非将艺术作为政治工具的功利主义者,他们的“政治性和超政治性思考与美学以及日常实践在公共领域中”有着内在的统一,在达成这种统一的共同体中,“人与人平等相处,没有统治者,也没有顺服者”^[9]。布鲁姆斯伯里圈追求纯美艺术,他们的批判意识并没有因此被消磨。

作为对纯美艺术理念有着共同追求的布鲁姆斯伯里人,伍尔夫对文艺-作家-读者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反思。在随笔《倾斜之塔》中,伍尔夫尖锐地指出了作家与文学的异化关系。伍尔夫认为,19世纪的英国一直处于战争频发的状态,但是作家群体稳居文学的斜塔,似乎从未受到影响,他们也不曾想过从塔上下来。然而,斜塔恰巧又决定了他的视角,影响了他表达情意的能力,因此在他们所摹写的人生中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人物失去了真实存在性。一战的爆发彻底动摇了整个社会文明的根基,曾经的斜塔已不再稳固,作家们囿于他们所受的教育与家庭财富,迟迟不愿走下斜塔。他们的作品中到处反映着纷争与苦涩、迷乱与妥协,逐渐地,这些情感被一种“劝善、说教和装腔作势的口吻”^{[10]725}所替代,他们被迫成为“政客”,而斜塔俨然成为了躲避现实的“避难所”。需要注意的是,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圈的成员们虽然看似正符合斜塔之上的艺术家群体,但就其聚会交流主题与具体行动而言,早已脱离了最初纯哲学论辩与形而上的交谈,转向了更为现实、日常的生活。作为和平的追随者,布鲁姆斯伯里人不仅以文学艺术的方式反抗军国主义,更以拒服兵役的具体行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他们并非象牙塔上不谙世事的知识精英群体,而是切身走向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阶层,极具社会意识和民主倾向。无论是伍尔夫、福斯特等人的文学创作及实践,或是克莱夫、弗莱等人的艺术批评,都以自己的方式对大众进行美育工作,以文化熏陶的方式唤醒公众的感知力与审美力。凯恩斯和伦纳德更是公共政治生活的活跃分子,直接参与政治高层和社会基层的各项政治活动。最后,伍尔夫呼吁作家们鼓起勇气集体走出斜塔。文学创作的核心是人,作家只有走出象牙塔才能体验百态人生,而创作的本质要求是描写“无数个对象的集合体。两个字就能将作家观察的一切事物涵盖,这两个

字就是——人生”^{[10]707}。基于情感体验的人文关怀才是文学创作的最终价值归属,而作为读者,也应不加区别地进行阅读,无论小说、诗歌、戏剧、传记或者历史。不要羞于接近曾经立于塔尖的文学之地,要把文学这个领域变成自己的领域,保持传统,更有所创新。

1925年和1933年,伍尔夫相继出版了两套《普通读者》,其中收录了她众多散文、书评与随笔,伍尔夫也被誉为“新散文的首创者”。在第一卷的开篇“普通读者”一文中,伍尔夫借用英国文学评论家塞缪尔·约翰生(Samuel Johnson)对普通读者的理解,诠释了自己心中的普通读者形象。约翰生认为,普通读者不需要极高的教养或才能,他的阅读行为纯粹出于愉悦自我的本能意识,而非为了传授知识或者指正他人。伍尔夫也认为,普通读者的阅读行为并非出于追求高深学问的意图,他们不曾受学术教条的影响,往往通过自己的直观感受塑造对生活、人性的完整印象,从而达到思想的自由。正是这些“普通读者”的存在,促进文艺走向更真实、更深远的一面,而文化氛围的变动又将进一步影响作家的创作。

实际上,无论是文学与作者的关系,或是文学与读者的关系,矛头都直指文学的教化功能。文学的教化功能是文学史上老生常谈的内容,文学界时常强调文学创作对读者道德品行的影响,而社会道德功用又时常反过来成为强化文学权威的传统做法。布鲁姆斯伯里圈追求情感与智性自由协作的美学主张,在伍尔夫对待文学审美教育的观点中也打下了鲜明印记。在伍尔夫的社会愿景中,美学与德性始终密切相关。有别于道德说教,文艺更多地挖掘人性,塑造人们敏锐的洞察力与同感心,这种人格性情也是创造康德所说的“社群协和”的重要条件。但是,伍尔夫清楚地意识到,审美与德性的互动极易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甚至造成一种自我与社会间的激烈冲突。伍尔夫通过创作实践和批评反思来展现、探讨启蒙的人文价值。她对文学在教化基础上进行超越的强调,实质上也是对文学作品通过情感触动理智、为读者塑造自由意志的功能的强调。对于伍尔夫本人和布鲁姆斯伯里圈来说,这才构成文艺创造的终极价值。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者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是最早强调布鲁

姆斯伯里圈价值关怀重要意义的学者之一。他用“社会良心”和“关怀弱势者”来形容布鲁姆斯伯里圈的政治特点,并指出,无论是战争时期或是经济大萧条时代,布鲁姆斯伯里圈的成员们顶着各种质疑的压力,始终坚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创造有利条件,反对纳粹统治、阻止欧洲文明滑坡。威廉姆斯进一步强调,布鲁姆斯伯里圈拥有一种对智识审美的信仰,认为社会进步需要依靠和培养更多“文明的个体”^[11]。诚然,文明的核心并非物质社会或是制度建设的进步,更在于个体心智力量的强大,唯有“文明的个体”不断丰富发展,才有望改善传统价值观念下的公共德性,使社会实现真正的文明与和谐。布鲁姆斯伯里圈糅合了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思想,伍尔夫也深受布鲁姆斯伯里圈文艺观念的影响,在反叛抗争与反思诘问的行为中与之达到了高度的精神契合。

尽管,布鲁姆斯伯里圈始终是松散的团体,且成员们无论对文学、艺术或是政治都没有完全一致的观点,但他们拥有着大体一致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成员各自所从事的不同领域也使得这个圈子的视野十分开阔。他们在思想上各抒己见,关注的问题和研究的思路也众多,时常给人带来各种革新的观点。松散的组织关系更是让团体成员像朋友一样紧密联系着。“布卢姆斯伯里圈子最伟大的遗产,其实是他们对友谊的理念。无论年龄、成就,还是在艺术和爱情上的对立,或是职业差异和亲疏关系,又或是因为战争、旅行或工作造成的长期分离,没有什么能让这些年轻时就走到一起的人们分开。”^[12]伍尔夫作为布鲁姆斯伯里圈的核心成员,与该团体所提倡的艺术形式展开积极对话,不仅为该团体带来了许多独特的观点,丰富了该团体的艺术理念,她本人也深受成员们文艺观的影响,在对文学实验的不懈探索中,形成了独具美学特色的文学观。

三、伍尔夫文学创作对布鲁姆斯伯里圈文艺观的超越

身处无限灵感、无限激情与无限才华的知识分子小团体中,伍尔夫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吸收了众多布鲁姆斯伯里人的优秀观点,并且将其进一步深化发挥,逐步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风

格,形成了独到的文艺观。

首先,伍尔夫发展创造了全新的“诗化小说”。其“诗化小说”并非形成于偶然,发展源头可以追溯到弗莱与克莱夫的形式美学。克莱夫“有意味的形式”激发了伍尔夫意识流小说中对创作形式的超越,对传统小说艺术观的突破。虽然弗莱和克莱夫的美学观是针对视觉艺术领域的,但是它与伍尔夫现代小说的艺术理念中对小说形式和真实情感的追寻不谋而合。在随笔《论小说的重读》中,伍尔夫指出“形式”来源于视觉艺术,但不同于克莱夫认为“有意味的形式”仅存在于审美情感中的观点,伍尔夫认为它也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她将克莱夫的“有意味的形式”融入小说,对小说形式重新释义:“某种超越情感的东西,某种虽由情感所发、却又稳定情感、控制情感、建构情感的东西”^{[10]740}。她认为,“书的本身”是形式与内容的结合,眼睛无法辨别形式,因为形式不仅包含了作者精湛高超的技艺,也包含了作者多种蓄以待抒的情感,这些共同形成了一个整体保留在作者与读者的心灵中,构成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小说《海浪》与印象主义画作一样,展示了非个人化和情节的抽象化。在小说的各个部分之间,作者都描绘了从晨曦至落日期间的大海与天空的变幻场景,但这种瞬息万变的印象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而与人物情感融为一体,成为其内心世界的呈现。正是在此基础上,伍尔夫开始主张非个人化的“诗化小说”,摒弃传统记录细节事实的方式,通过概要描写的方式将人物的情感和思想表达出来,将生活的复杂与不和谐之处呈现出来,描绘人与自然、命运关系,甚至人的想象与梦想。但它表现的只是抽象而非具体的内容,因此又要求作家站在从生活后退一步的地方进行撰写,以此得到宏观的整体视野。此时,小说人物已不再是个人所有,而化为一种大我,一种超脱于现实生活的精神力量的象征。《雅各布之屋》中的雅各布是一位不曾出场的主角,但是整本书却将读者拉入了雅各布一生的意识活动之中。《墙上的斑点》不同于传统小说,没有日常细节描述,而是从叙述者偶然瞥见的墙上的斑点入手,经过一系列想象活动,揭示人生变幻无常的道理。

其次,伍尔夫以意识流手法追寻“生命真实”。布鲁姆斯伯里圈的成员都在各自的领域追求自由

的生活态度与人生真理,在文学领域的反映,则是摒弃功利主义的虚伪做作,捕捉“内在真实”。需要注意的是,伍尔夫所追求的整体视野并非完全忽视物质世界,对人物心理的捕捉也非一概而论,而是通过“去杂质法”——删除不必要的情节,筛选留下那些有意味的因素。在“小说的艺术”中,伍尔夫批判哈代过分服膺情节需要,强调小说的故事、人物、情节、模式和节奏等元素,仅仅只是一位“故事叙述者”^{[10]687}。在伍尔夫看来,小说家在有意味的形式之下应该紧扣人物的意识活动这一重要因素,牢牢抓住一个具有丰富感情的、多层次多方位的、活生生的人,这样的人物才是具有灵魂的角色,才富有真实人性。伍尔夫对于情节的淡化体现在其多部小说中。在《雅各布之屋》中,伍尔夫成功实践了她的创作形式观。整部小说没有一个固定的情节线索,关于主人公雅各布的一生,读者也是透过小说其他人物而寻得,零零碎碎的印象拼凑齐了雅各布一生的故事。伍尔夫对雅各布这一青年形象的塑造方式,远比平铺直叙地描绘更能带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熟悉感。这一手法在《达洛卫夫人》中也得到了体现。这部长篇小说是伍尔夫个人风格趋于成熟的代表作品,其中既无跌宕起伏的情节,亦无哀婉动人的插曲,但这看似平淡无奇的内容背后,却饱含了对现实生活的展示,也包含了各色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在这部小说中,达洛卫夫人虽是最重要的主人公,伍尔夫却没有给予她过多个人描绘,而是以一种多层次、多角度的方式使达洛卫夫人成为读者最为熟悉的形象。

实际上,纯粹的情节过滤并不是伍尔夫创造“真实生命”的唯一手段。不同人对真实的感受不尽相同,但真实在某种程度而言是客观的。人们的真实情感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心理状态的变化而各有不同。因此,伍尔夫要求作家拥有一颗“明净的、消除了窒碍的头脑”^{[13]121},在这里,所有的抗争、告诫、谴责、报复都燃烧殆尽、烟消云散,也唯有如此,内心的东西才能得到完整释放,而他的诗章也将喷薄而出,酣畅淋漓。这样一颗炽热澄明的大脑必然是“雌雄同体”的,因为“纯粹男性化的头脑不能创造,正如纯粹女性化的头脑也不能创造”^{[13]211}。布鲁姆斯伯里圈强调情感与智性的协调发展,伍尔夫更是在此基础上追求整合了

性别差异的“双性同体”理念,强调双性和谐的头脑能有效激发各类想法,而这些想法能将人物的客观真实加以提炼,把握永恒生命的真谛并获得“终极真实”。在《海浪》中,伍尔夫借伯纳德之口提出了“小语言”(little language)的概念:“我开始渴望某种简洁的语言,就像恋人们常用的那种,断断续续的字句,含糊不清的字词,好似人行道上拖曳的脚步声”^[14]。在《奥兰多》中,伍尔夫对这类语言也有过叙述:“倘若这些话听起来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琐碎又枯燥,又是根本不知所云,那就是读者的错了,谁让你听一位女士自言自语呢……因为她漫不经心地一笑,就带过了全书的高潮和尾声。……一切都乱套了……不论是非,她成为所谓唯一的自我、真实的自我”^[15]。简·马库斯认为,伍尔夫所指的破碎的语言能“有效地填平男人们造成的分裂和空隙”^[16]。伍尔夫的“小语言”虽是一种原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摒弃了一切男性话语,相反地,它缺乏一般的逻辑结构和理性规范,仅仅是一种单纯的音韵、节奏,甚至是一种无声息的动作。它没有过多实质的内容,却又隐藏着丰富的联想空间,使大脑丰盈、感知真实。这样一种“小语言”似乎也正是布鲁姆斯伯里圈交流时的语言模式:“他们在表述整个句子时语速不停地变化,就像是在不停换挡的汽车,其中还夹杂着许多明显是毫无必要的成分”^{[8]24-25}。

如果将伍尔夫的创作形式观、生活真实观、双性同体观等文学理论观点放在一起进行考察,不难发现伍尔夫在小说艺术的领域中追寻一种透视方法,即由传统的对客观事物的描绘转向人物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感受,用伍尔夫的话来说,她的文学创作正向着心理学的领域发展:“我觉得我写书的做法和精神分析家看病的做法不谋而合,我们都是把沉淀已久、牵肠挂肚的情感宣泄出来”^[17]。对伍尔夫而言,在物质急剧膨胀的时代,文学观念的合理变迁可以有效抵制功利逻辑,完善人类的审美情感。伍尔夫通过其自身丰富的艺术创造力对布鲁姆斯伯里圈的文化观加以审视与超越,最终形成了其自身独特的文学观。

四、结语

文化交流是文化进步的重要条件,文化的差

异又推动了文化的多样性。布鲁姆斯伯里圈就像一条文明的彩虹之桥,由缤纷的思想汇集而成,美艳了整个世界。布鲁姆斯伯里人拒斥传统的道德戒律,追寻当下的生活体验,他们各自的美学主张共同为后世公共生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无论是布鲁姆斯伯里圈的精神氛围或是生活方式,都对伍尔夫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布鲁姆斯伯里圈对纯美艺术的追寻、情感与智性自由协作的美学主张,更是代表了伍尔夫完美的人格理想与自由写作的梦想。可以说,伍尔夫的一生都在摸索寻找纯真的艺术创作之路,而布鲁姆斯伯里圈的存在则为她指引了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JAMES C. Cultural Amnesia: Notes in the Margin of My Time[M]. New York: Picador, 2008: 233.
- [2] MOORE G E. Principia Ethic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37.
- [3] KEYNES J M. My Early Beliefs [M]// ROSENBAUM S P, ed. The Bloomsbury Group: A Collection of Memoirs and Commentary.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of Toronto, 1996.
- [4] HOLROYD M. Lytton Strachey [M]. London: Vintage, 1995: 89-90.
- [5] DAVID G. Great Friends: Portraits of 17 Writers [M]. London: MacMillan, 1979: 155.
- [6] FRY R. Living Painters: Duncan Grant[M].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23.
- [7] 克莱夫·贝尔. 艺术[M]. 薛华, 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4.
- [8] 奥斯伯特·西特韦尔. 休战期间的布鲁姆斯伯里[M]// 罗森鲍姆·S P. 回荡的沉默: 布鲁姆斯伯里圈侧影. 杜争鸣, 王杨, 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 [9] FROULA C. Virginia Woolf and the Bloomsbury Avant-Garde: War, Civilization, Modernity[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3.
- [10] 弗吉尼亚·伍尔夫. 伍尔夫随笔全集 II [M]. 张军学, 邹枚,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11] WILLIAMS R.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M]. London: Verso, 1980.
- [12] 奈杰尔·尼科尔森. 伍尔夫[M]. 王璐,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14: 49-50.
- [13] 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间自己的房间[M]. 贾辉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14] 弗吉尼亚·伍尔夫. 海浪[M]. 曹元勇,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215.
- [15] 弗吉尼亚·吴尔夫. 奥兰多[M]. 林燕,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300-304.
- [16] MARCUS J. New Feminist Essays on Virginia Woolf [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1: 253.
- [17] 弗吉尼亚·伍尔夫. 存在的瞬间[M]. 刘春芳, 倪爱霞, 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6: 102.

(责任编辑: 粟世来)

Virginia Woolf's Acceptance of and Transcendence over the Bloomsbury Group in Literary View

QIU Gao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Hunan China)

Abstract: The Bloomsbury Group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elite cultural group in Britain in the 20th century, which is famous for its anti-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s a core figure of the Bloomsbury Group, Virginia Woolf has been actively engaged in dialogues with the literary view advocated by the Group through literary creation. Her literary creation reflects the distinct Bloomsbury ethos, that is, the unremitting pursuit of pure art and the free cooperation of emotion and intelligence. Woolf's transcendence over Bloomsbury's literary view is embodied in her view of creative form, reality of life and androgyny, which has left valuable cultural relics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Key words: the Bloomsbury Group; Virginia Woolf; literary view